

文本与世界

——保尔·德曼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 昂智慧 著

本书为国家“985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成果
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助

本书为国家“211工程”三期“中国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化复兴”项目成果

博

达

文

丛

文本与世界

——保尔·德曼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 昂智慧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本与世界:保尔·德曼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昂智慧
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博达文丛)
ISBN 978-7-208-08374-5

I. 文... II. 昂... III. 德曼—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 IV. I71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1213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季宵瑶

封面装帧 北戈工作室

· 博达文丛 ·

文本与世界

——保尔·德曼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昂智慧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 217,000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374-5/I·632

定价 20.00 元

序

杨正润

保尔·德曼有句名言：“时尚正如奇妙的火焰留下的灰烬，它是足以表明火焰确实燃烧过的痕迹。”我觉得这话也可以用在德曼本人身上，这有两个理由：第一，在一个对传统盛行质疑、消解和颠覆的年代，德曼成了一种理论倾向的旗帜，于是这个寂寞多年的老人，一下子突然成了学术的时尚，在一段时间里，搞文学理论的人不说保尔·德曼就好像成了一件很落伍的事。不管对德曼了解多少，在许多人那里不是德曼就是德里达，总是挂在口边。

第二，德曼是一位有着很高智慧的学者，他大半生里都在形而上的领域里进行艰辛的思辨游戏，而且同许多那种类型的学者一样，他们写下的只是他们思考的一小部分，他们的著作是思想的火焰燃烧后留下的痕迹。读他的书，最好一步步重复他思考的过程，这样才能读懂，这时他的书才更富启迪。

也许有人会问：德曼的这套理论对文学、特别是对中国文学有什么用呢？我想，雅典人对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据数理哲学家罗素说，欧几里得的许多原理对希腊人确实毫无用处，比如他关于圆锥体的公式，是到18世纪，也就是欧几里得两千二百年之后才有实际用途的。尽管我曾撰文批评过德曼和海德格尔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但我想，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学术工作，人类精神劳动的成果应当得到珍惜。

时代毕竟在进步，学术也在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珍惜思辨的意义，就有人愿意用德曼留下的灰烬去重现和探析那火焰的燃烧——放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本书。

这部《文本与世界》从清理德曼同解构主义和新批评的关系着手，论析其间的理论联系和差异，然后辨析德曼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理论，再以卢梭的两部作品为个案，研究德曼的文本阅读方式及其理论的运用，最后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把德曼同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中国的庄子等进行了比较。这样，就对德曼的批评理论作出了相当完整、又有相当深度的剖析，或者说重新勾画了那火焰的燃烧过程，也围绕着德曼同西方学术界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我想，这在中国学术界还是第一次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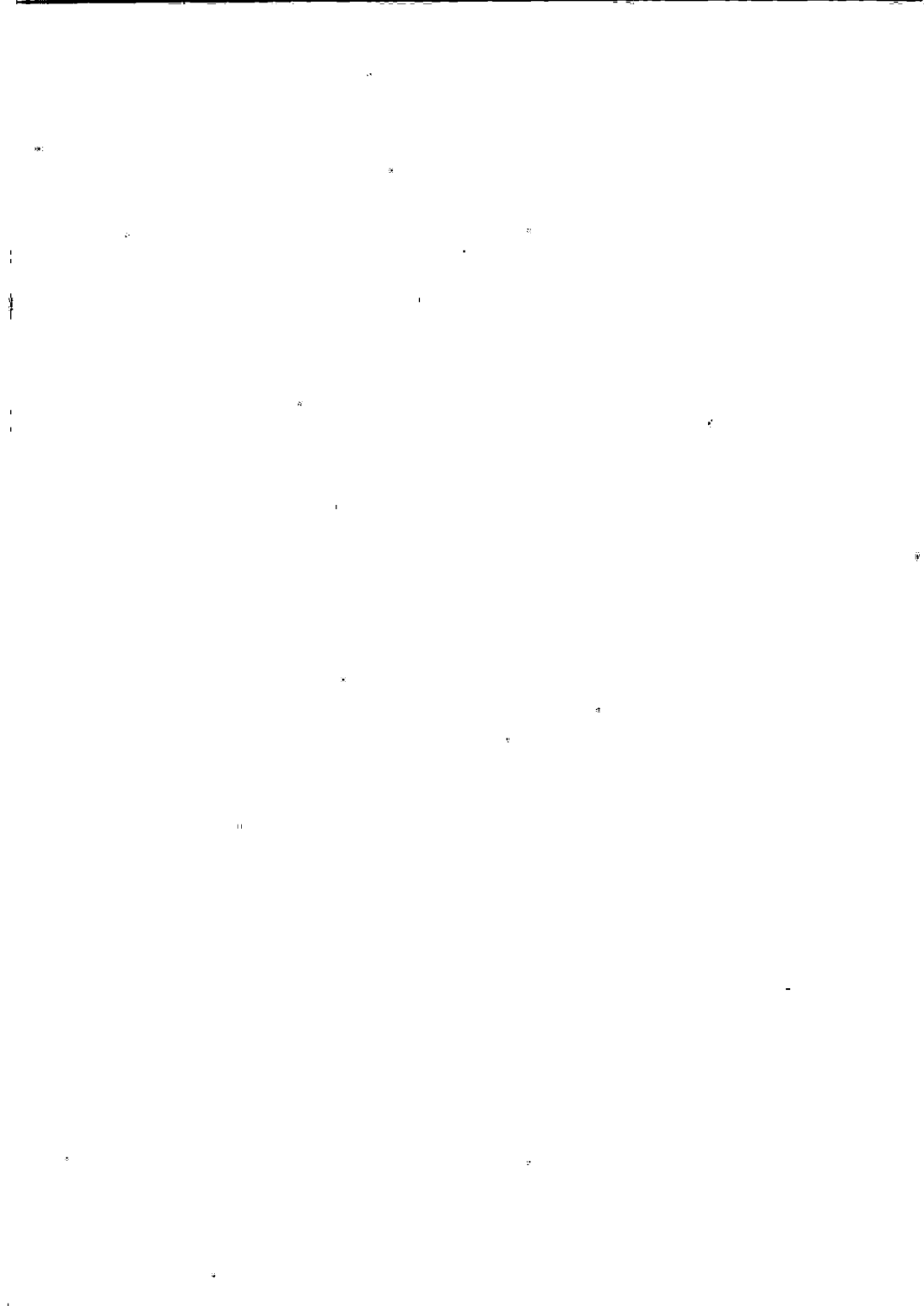
本书是昂智慧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同智慧相识多年了，她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我所指导，我对她颇有了解。她有不错的专业基础，我开玩笑说父母给她起了个好名字，她聪明有灵气，悟性颇高，对理论思辨有着特别的钟爱。不过当年她提出要以德曼为题目做博士论文时，我还是有些犹豫。德曼的学术地位、他的论著所包含的学术空间、国内德曼研究的现状，从这些方面看当然是适合的选题；但是德曼以“无法解读”闻名，文学批评、哲学理论以及语言学理论在他那渊博的头脑里融为一体，其玄思奇想艰深晦涩，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学人视为畏途。德曼的许多主要著作又没有中译本，这样一场智力的游戏，岂是等闲！

不过考虑再三，我最后还是同意了智慧自己的选择，我相信苏格拉底的名言“好奇是智慧之母”，科学的探索总是以兴趣为前提。攻读博士的“智慧”既然对德曼充满兴趣、知难而上，我当然乐观其成。现在看来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论文答辩时就得到专家的好评，这几年来智慧对原稿又进行了大量修改和补充，她收集了更多第一手资料，德曼本人的论著和国外研究德曼的重要成果几乎收罗无遗，梳理辨析更为精细，也更多超越了对德曼的崇拜，显示出成熟的学者不可或缺的批判精神。

智慧此书即将付梓，命我作序，我自然推辞不得。这几年学生出版

博士论文或博士后报告要我作序的有好些了,动笔前免不了把他们的文稿再翻一遍,看到文中的那些仍然熟悉的观点和话语,真是如睹故人,回想起他们当年写作的经过,想到他们写作过程中经历的磨难,也想到我同他们讨论以至争论的情景,不免生出种种感慨来。智慧的这篇论文是写得苦、我也看得苦的论文之一。但是苦尽自有甘来:自然不可能凭这样的著作成为学术超女,但是在自己的心中复现和观照那火焰的燃烧,聆听一位哲人强大心灵的跳动,有多少人能享受这样的乐趣呢?

2007年9月1日 秦淮河畔



前言：保尔·德曼、 “耶鲁学派”与“解构主义”

保尔·德曼(Paul de Man)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之一。美国评论家马丁·麦奎兰(Martin McQuillan)在2001年出版的关于德曼的学术评传中指出,德曼是第一个明确地把理论观念引入文学批评的人,虽然德曼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德曼可以说是美国文学批评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而且在未来的文学批评论争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①。德里达在回忆德曼时指出,德曼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贡献就在于,他充当了文学理论领域里的一个中转站,从而“使得大学内外、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一切通道都重新畅通起来”^②。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把德曼的去世视为美国文坛的大“悲剧”^③,他对德曼的崇敬难以言表。而米勒(J. Hillis Miller)曾经断言:“假如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变成德曼所期望的那种读者,人类公正、和平的千年……就会到来。”^④

不过,正如马丁·麦奎兰所说,德曼确实是一个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的人物,他的文论作品既引发赞誉也招惹责难,两者的比例基本相当。对于德曼的崇拜者、朋友和学生来说,德曼代表着美国文学理论的未来,他是那么博学、善辩,其理论思想奇妙无比,具有极大的启发力;而在他那些反对者们看来,他的理论作品是“不可理解的”、“非政治的”,甚至是“反人类的”、“邪恶的”。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

① Martin McQuillan, *Paul de Man*, USA, Canada: Routledge, 2001, pp. 1—3.

② Jacques Derrida, *Memoirs for Paul de Man*,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vxii.

③ Geoffrey Hartman, “Looking Back on Paul de Man”, in *Read de Man Read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 4.

④ J. Hillis Miller, *The Ethics of Reading: Kant, de Man, Eliot, Trollope, James, and Benjam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8.

说,德曼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上遭到攻击最多的文学批评家。德曼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原因非常复杂,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德曼自己的朋友和敌人,一致把他误解为“解构主义”的旗手;而且,他还被想当然地划归为“耶鲁学派”(又被戏称为“耶鲁四人帮”)的头目。在这个地位上,德曼所受到的攻击,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实是非常冤枉的,因为所有自称为(或被误解为)“解构主义”和“耶鲁学派”的批评家和学者的错误都成了他的错误。其二,德曼本人的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是对其他文论家的批评活动进行再批评,而且,他所批评的文论家中有一些人也是以文学批评本身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的(所以德曼的批评活动被讥讽为“批评的批评的批评”[criticism of criticism of criticism]),而且,由于他的许多思想观点非常具有震撼力和“危险性”,许多人感到不得不奋起反击。其三,德曼个人的经历也很复杂,他在纳粹占领比利时时,曾经为与纳粹合作的报纸比利时《晚报》撰写过许多具有反犹太人倾向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德曼于1983年去世之后被人们发现了,此时着实掀起了一股批判德曼和解构主义的热潮。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其实只有第二个方面的攻击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论争,其他两个方面的攻击大多起因于政治的和帮派体系的偏见以及理论上的误解和无知。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些攻击对于正确地理解和研究德曼的文学批评理论构成了严重的阻碍,因此,有必要在此进行简单的梳理和解释。

所谓“耶鲁学派”,指的就是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并活跃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几个有影响的教授,包括保尔·德曼,哈洛德·布罗姆(Harold Bloom),杰夫里·哈特曼和J.希利斯·米勒。美国批评家威廉·普里查德(William Pritchard)早在1975年就在《哈德逊评论》上撰文把耶鲁大学上述四个最有名气的批评家称为“阐释学黑手党”(Hermeneutical Mafia)^①。普里查德的这种提法一方面说明了

① William H. Pritchard, "The Hermeneutical Mafia or, After Strange Gods at Yale", *Hudson Review*, 28(Winter 1975—1976).

这些批评家的批评活动在当时美国文坛上所引起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不仅不是为公众所欢迎的,而且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敌视与误解。随后,另一位批评家弗兰克·兰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在他那部引起极大反响的著名论著《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中又嘲讽说,如果确实有一个黑手党,那么就应该有一个教父。兰特里夏认为这个黑手党的教父只可能是保尔·德曼。因为,在这些后来又被称为“耶鲁四人帮”的批评家当中,德曼是公认的带头人,他当时是耶鲁大学法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的主任,其他三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而且,兰特里夏还特别指出,其他三位批评家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文章里,每每提起德曼的时候,语气都非常恭敬甚至带有崇拜的意味。不仅如此,德曼之所以被封为教父,在他看来,还因为,德曼总是给人一种自己已经真理在握的感觉,而且,总是用一种很“酷”、很直截了当的方式说话:“他从来都是三言两语、非常简单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从不费心去细致解释和论证,就好像黑社会里一贯存在的现象:头领不说话则罢,一旦说话,每句都是权威性的,只要求被执行,从不需要解释。”^①这里的讽刺和挖苦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这个所谓的“学派”其实并不是什么“学派”,而仅仅是文人之间诽谤和攻击的靶子而已。那么,究竟是否应该把德曼划归“耶鲁学派”,这在美国文坛上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真正严肃认真地研究德曼文学理论思想的学者,大多认为这样一种提法根本不利于人们理解德曼。曾经编辑和出版了德曼大量学术论著的美国学者林塞·沃特斯明确地指出:

真有一个“耶鲁派”存在吗?如果这样一个学派确实存在,是否会影响我们对德曼的评价?德曼和他的同事们之间的联系确实很紧密。

① Frank Lentricchia, “Paul de Man: The Rhetoric of Authority”, in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283—284.

他很可能把他们都推向一个特定的发展方向……但是,除此以外,耶鲁学派并不是一个统一战线,而且如果我们那样看待这些学者们,只会给我们理解他们的学术成就造成更大的困难。^①

鉴于此,关于所谓的“耶鲁学派”,我们并不能够贸然接受,或把它当作某种确定的理论概念来加以研究^②,因为,从根本上来看,耶鲁大学的这些学者们并没有理论上的紧密关系,这个所谓的学派完全没有任何严谨的理论基础。在“耶鲁学派”的内部,只有米勒竭力宣传他们四个人(后来还加上德里达)是一个整体,其余的人都没有公开地承认相互之间有任何理论上的关联。布罗姆甚至还特意撰文反驳米勒的观点,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和对德曼等人观点的异议。不过,“耶鲁学派”的“教父”这个提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点启发意义,因为它可能从反面说明了德曼在美国文坛上曾经有过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对于自己在耶鲁的同事们的学说研究的重大影响。

1979年,德里达和德曼以及德曼的同事们合作出版了《解构与批评》^③。在这部书里,德曼等人分别撰写了一篇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评论雪莱去世前创作的最后一首未完成的长诗《生命的胜利》,德里达在他的那篇文章的后半部分详细地解释了“解构”作为一个策略和方法论的功效,所以,这部书不仅客观上加强了人们把耶鲁学者们视为一个团体的印象,而且,给这个团体增添了一个新生力量——德里达,并且规定了一个特定的性质——解构主义。艾丽丝·卡普兰(Alice Kaplan)当年曾经是耶鲁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她在自己的回忆录《法语课》中写道:“那一年,德曼和他的几个同事一起出版了一部论文集,叫做《解构与批评》。突然,它有了名字,成了一个流派,而我们都在其中,并

① 林塞·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昂智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② 国内有学者曾经撰文研究“‘耶鲁学派’的成因”,这显然是把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当成了既定的事实来接受了。

③ Bloom, Harold, Paul de Man, Jacques Derrida, Geoffrey Hartman and J. Hillis Miller, ed.,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9.

且有责任在餐桌上向大家解释它。”^①从此，德曼被认为是德里达在美国的代言人，而“耶鲁学派”也被认为是所谓的“美国解构主义”。

由于种种非学术的策略上的考虑，在耶鲁大学以及相关的出版商那里，人们似乎也并不反对（甚至还鼓励）这样一种误解，所以，“解构主义”这个称号也就被各方欣然接受了。例如，米勒在回忆德曼时强调说，德曼认为，“未来几年的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一种采用通常被称为解构的修辞阅读方法对所有的文学进行全面的占有（imperialistic appropriation）。”^②但是，这其实是米勒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德曼的。事实上，米勒在所谓“耶鲁学派”的形成和“解构主义”阵营的产生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③此外，德曼的学生芭芭拉·琼生也一直在宣传德曼与解构^④的紧密关系。对于米勒等人来说，人们把他们称为“解构主义”^⑤，这在某种程度上看，是对他们的赞赏，同时，也是他们成为领导文坛新潮流的标志和融入后现代思潮的标志（根据“后现代”这个术语所内含的时间逻辑来看，“解构主义”既然是一种崭新的文学批评模式，自然也就是后现代的了）。由于这些人并没有特别的理论创见，而德里

① Alice Kaplan, *French Lessons: A Memoi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153.

② J. Hillis Miller, *Theory Now and Then*, P385, quoted from “Deconstructive Debacle, J Hillis Miller”, in *The Critical Decade, Culture in Crisis*, Carcanet Press Limited, 1993, p. 114.

③ 米勒曾经撰文宣布“耶鲁学派”的成立，而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还声称，德曼、布罗姆、哈特曼、德里达和他自己“走到一起来了”。参见 J. Hillis Miller, “Steen's Rock and Criticism as Cure. II”, *Georgia Review*, 30, 1976, p. 330. 1983 年, Jonathan Arac, Wlad Godzich 和 Wallace Martin 编辑的《耶鲁批评家：解构在美国》(Jonathan Arac, Wlad Godzich, Wallace Martin ed., *The Yale Critics: D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根据编者事后透露，这个书名出自出版商的提议，多少带有一些炒作的嫌疑，它客观上也加强了人们关于“耶鲁学派”和“美国解构主义”等不恰当的术语的误解。

④ 需要说明的是，琼生并没有使用“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这个词，她用的是“解构”(deconstruction)。

⑤ 最明确地把“解构”当作一个流派来解释的正是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参见 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但是，卡勒似乎仅仅是作为一个阐释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也没有把问题提高到“主义”的层面。因此相反，大量使用“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这个词的都是一些德里达和德曼以及所谓“耶鲁学派”的反对者，所以，这个词非常可疑。

达在美国日益走红,“美国的解构”这一称号也越来越动听。所以,依附于这个响亮的字眼不仅对于他们个人没有任何损害,反而可以增加知名度。德曼作为“解构主义”的主将这一观点之所以至今仍然在美国和中国被广泛地接受,其部分的原因就在这里。

不过,德曼同“解构主义”的关系因为涉及学术思想方面的复杂问题,倒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德曼确实在一些学理的层面上同情德里达等人的观点,例如对文本的互文性的强调(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对语言的重要性的强调)等;但是,德曼的许多理论观点又不是德里达等倡导“解构主义”的人所能够理解和认同的。加谢曾经比较明确地指出,如果从与当代文学批评思潮的相似性和联系的角度去解读德曼,必将无所收益。^①此外,他还认为,德曼在使用一些常见的理论术语时,往往是我行我素,不顾一般大众对那些术语的常规用法,具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个人特异性(idiosyncratic)。^②例如,“解构”、“修辞”、“寓言”(allegory)、“象征”等术语。这里我们集中探讨德曼对于“解构”这个词语的独特理解,并与德里达的观点稍加比较,以期辨析出其中的关系和区别。德曼本人确实非常赞赏“解构”这个名词,他的文学批评中施行了某种揭发作品的自我颠覆的行动。他自己也承认,他确实从德里达那里引进了“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词。德曼曾经在《阅读的寓言》的前言中明确断言:

没有任何其他词语比这个词[解构],更简洁地说明了它所暗示的那种不可避免的评价之不可能性,无论这一评价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第一次注意到“解构”这个词是在雅克·德里达的作品中……^③

① Rodolphe Gasche, *The Wild Card of Reading*,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98, “Introduction”, p. 2.

② Rodolphe Gasche, *The Wild Card of Reading*,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98, “Introduction”, p. 4.

③ Paul de 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x.

另外，自从1966年结识德里达之后，德曼把德里达聘为客座教授并每年都邀请到耶鲁讲学，德曼与德里达的关系之密切，也是有目共睹的。从上述种种原因来看，尽管德曼从没有用过“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这个词^①，他却被想当然地归到德里达所倡导的“解构主义”的阵营之中，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客观原因。

相反，倒是德曼的一些反对者们反对把德曼称为解构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经把德曼称为“落伍的现代主义者”。他认为，在德曼这里，“一种完全自治和自我验证(self-justifying)的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终是不可能的”^②。詹姆逊还认为，德曼“提出了一种垂死的现代主义的视野”，所以是“一个相当落伍的人物”，在他那里，“正统的现代主义价值观”的残余仍然“很强硬和喧闹”^③。另一位批评家罗伯特·L. 凯瑟鲁(Robert L. Caserio)指出，詹姆逊的意思就是，德曼代表了“现代主义依然活跃[在我们后现代时期]的现象”。他不仅同意詹姆逊的观点，而且还补充说，德曼所复兴的寓言概念在他看来是“现代主义颠覆故事和历史的、最落伍的和最重要的新篇章”。所以，他认为：“奇怪的是，我们居然把德曼同德里达以及解构联系了起来……”^④这里，我们且不去追究詹姆逊或凯瑟鲁对于德曼的指责是否合理，而只是以此来说明，他们的言论从反面证明了德曼作品从客观上来看，确实有许多与德里达、“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时髦的名词不相符合的东西。

德曼与德里达等人的区别或许主要就在于“解构”和“解构主义”之间的差异。“解构”一旦成为某种主义，它就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成为

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批评界，人们大都只在挖苦和批判德里达或德曼等人的时候，才使用“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这个词，其余情况下只用“解构”(deconstruction)。

②③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6.

④ Robert L. Caserio, "The Heat of the day: modernism and narrative in Paul de Man and Elizabeth Bowe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June 1993, v54 n2 p. 263.

一种主张和宗旨了。换言之,在德曼这里,解构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使他得以解释许多令他困惑的难题,但是,一旦被上升为“解构主义”,它似乎就成了文学批评的某种目的和意图,不仅必然地被戴上了虚无主义的帽子而且也难免显得粗鲁和独断。如果把德曼视为德里达麾下的一员或“解构主义”阵营的主将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把他的思想与德里达等人的观点等同和混淆,于是,误解和简单化就产生了,德曼的文学批评也就因此被限制和歪曲了。如果细致地阅读德曼和德里达的文章,人们就会发现,“解构”在德里达那里是一种哲学方法,它的主要策略是颠覆经典的二元对立命题,全面移换这个系统。德里达强调的是“解构”同“破坏”(destruction)的关系,但是,德曼认为“解构”更多地揭示出了文本中存在的某种事实,至多是一种阅读的辅助方法,其目的与“破坏”相去甚远。换言之,德曼强调“解构”仅仅是一个简洁而有效的词语,而且他认为人们把它简单地视为某种否定的过程,所以大大地误解了它:

如果把(解构)这个过程纯粹地视为某种否定的过程,某种东西就被遗弃了……不难预见,解构一词已经被人们大大地误解了,被作为某种学院派的无关痛痒的游戏而遭到抛弃,或者被作为某种恐怖分子的武器而遭到谴责……(AR, x)

事实上,“[解构]这个词的产生还与马丁·海德格尔有关,特别是他的《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的第二部分……”,^①德曼对“解构”的理解

①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23. 斯皮瓦克是德曼那些著名的女学生之一,她翻译出版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并且始终热衷于把德曼和德里达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斯皮瓦克在上述论著中就“解构”一词做了详细的说明,她的解释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与德曼不同,德里达更重视这个词所内含的“破坏”意味:“‘解构’(deconstruction)这个词是由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杜撰出来的,它起先出现在两篇文章中,它们后来被收入《论文字学》一书中。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1965—1966年间法国文学杂志《批评》中的一个书评中,它包含了‘破坏’(destruction)一词。这个词的产生还与马丁·海德格尔有关,特别是他的《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的第二部分……因此,对‘解构’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一种被截然修改了的海德格尔式项目。必须记住的是,海德格尔是尼采的热心读者,在尼采的著作中,‘破坏’(destruction)一词也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位。”

其实更加接近海德格尔在其早期作品中对这个词的使用。从海德格尔的文本中可以发现，他总是同时使用“解构”和“建构”这一对词语，显然他所强调的是解构所能够释放的、为建构而准备的、开放的空间和条件。

所以说，如果德里达确实提倡一种可以被称为“解构主义”的流派，德曼却并没有主动地和自愿地参与进去；而且，德曼本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明确地表示，自己同德里达是有差别的，人们确实应该把他们区分开来。他赞同伍劳德·高泽西(Wlad Godzich)和他的学生加谢(Gasche)对于他的评论：“当我不使用德里达的术语的时候，德里达和我最为接近，而当我使用德里达的术语(诸如“解构”)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最大。”^①德曼从没有借用过德里达的其他术语，诸如“异延”等，这似乎也可以说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重大区别。^②此外，德曼并不赞成时髦的字眼，这似乎可以作为他拒绝德里达的那些时髦术语的另一个原由。例如，德曼不仅对“现代性”这个词感到怀疑，而且特别反对所谓“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字眼。当他被问及如何理解关于当今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这个概念的论争时，他说：

对于我来说，困难就在于“后现代方法”(postmodern approach)似乎是一种幼稚的历史方法。现代性这个词已经是一个很含混的词了，而“后现代性”则成为对“现代性”这个词的一种戏拟(a parody)。这就好像“法国新小说”，“法国新新小说”，“新批评”，“新新批评”，等等。试图采用这个不断递增的现代性概念来定位文学上的特定时期，这似乎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也发生在哈桑的著作中)。令我吃惊的是，

① Stefano Rosso, "An Interview with Paul de Man", i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 118.

② 关于德曼与德里达的区别他的学生加谢曾经多次撰文论述。参见 Wlad Godzich & Lindsay Waters ed. *Read de Man Read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另参见 Rodolphe Gasche, *The Wild Card of Reading: On Paul de M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它是这样一个不现代的、守旧的和保守的历史概念，因为在这里，历史被视为某种持续不断的进程。这就说明了，这里所采用的历史模式是非常可疑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很幼稚和简单的。^①

总而言之，德曼的思想并不是“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时髦的字眼所能够覆盖的，所以，把德曼同所谓的“解构主义”^②不加任何区别地混同起来确实是一种可能对我们理解德曼造成严重误导的行为。这里，笔者反对把德曼视为一个“耶鲁学派”的成员或“解构主义”的干将，主要的原因在于：首先，德曼确实在很多方面同德里达以及所谓“耶鲁四人帮”的其他成员非常不同，他的思想根本不是“解构主义”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就能够概括的；其次，在文学和批评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草率地使用“主义”或“流派”来定位任何一个作家或批评家，因为这种定位往往对于这个作家或批评家的限制和歪曲。比如，在中国，由于保尔·德曼被想当然地视为德里达的同盟军，因此，在许多中国学者的眼中，德曼仅仅是德里达在美国的代言人，或者说他仅仅继承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而他本人似乎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创见。这应该说是德曼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

德曼之所以遭受误解和攻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撰写的一些有反犹太人倾向的文章在他去世之后被人们发现了。一时间，恰如一个德曼的反对者杰夫里·哈特(Jeffrey Hart)所嘲讽的，“泰坦尼克号(Titanic)第二次触礁”^③了。而且，这个“解构的杰出解说者”^④的丑闻被认为同时证明了“解构主义”的毁灭。

① Stefano Rosso, "An Interview with Paul de Man", i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p. 119—120.

②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部分地见出，这样一种主义是否真的存在，也是一个必须细致考察的问题，这里限于篇幅等问题，不便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不过，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回避，在一定程度上，也出于学术上的思考，因为如果对这个所谓的主义问题给以一定的关注，这个行为本身似乎就已经对它的重要性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暗示，而这正是笔者想要避免的误解。

③④ Jeffrey Hart, (book reviews) "On David Lehman's *Signs of the Time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Fall of Paul de Man*", *National Review*, March 18, 1991, v43 n4 p. 52.